

白樺美國之行

苦戀的告白

●王重則（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被視為反黨大毒草

白樺是中國大陸著名作家，他以「苦戀」作品聞名於國際文壇，他一九八八年八月初來美國，先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後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講演，受到各界極大的重視。

白樺原名陳佑華，一九三〇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信陽縣，一九四五年秋季，他在家鄉的初中畢業，翌年考入漢川中學高中部。那時中共在各校全力爭取知識分子，一九四七年他和學校裏的左傾分子往來密切，組織了「人民文藝社」，出版了油印的不定期刊物「人民」，開始用白樺筆名從事寫作。

此後他憑着一股激情，投入中共部隊，在共軍中擔任宣傳員，流動於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各省，後來轉入中共第二野戰軍，擔任文宣工作。中共政權成立後，參加中共「昆明軍區總政治部創作組」工作。在五十年代，他出版過長詩「孔雀」、「鷹羣」，詩集「金沙江的懷念」、短篇小說集「獵人的姑娘」等，還寫了相當聞名的電影劇本「山間鈴響馬幫來」。由於作品出版的

的滿足感，使他非常留戀這一段時光。這些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苦戀」裏面。

一九五六年，由毛澤東、周恩來主謀，發動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誘餌，最後以「反右派鬥爭」陽謀而結束。白樺在發言中，頗多批評之詞，使中共幹部不能容忍，終於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開除黨籍，下放勞動，被分配到上海「八一電影機械廠」作一名鉗工。

直到一九六一年，中共認為他改造期滿，由導演的安排，他進入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擔任編劇工作，這是他與電影工作發生關係的開始。

一九六六年，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白樺再度受到清算，被打成「異幫」，關入牛棚，受盡折磨，其悲慘的遭遇，反映在他「苦戀」裏的凌晨光、謝秋山身上。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十月毛妻江青被捕，鄧小平復出掌權。鄧小平為了清除江青餘黨的勢力，以便建立他自己的體系，一度掀起「平反冤假錯案」之風，白樺也在「平反」之列，恢復了黨籍和職務，在中共「武漢軍區司令部話劇團」擔任編劇，他「平反」後第一個劇本是

描寫賀龍事跡的「曙光」，之後他又創作了「苦戀」，這個劇本遭受中共全面的批判。

「苦戀」完成於一九七九年四月，發表於中國大陸「十月」雜誌的第三期，中共在香港的「文匯報」曾轉載過。原作以話劇形式寫成，後來由白樺和彭寧合作改寫成電影劇本。並拍成電影，片名改成「太陽與人」。先在中共中層以上幹部中放映，引起強烈反響，武漢軍區黨委上報中共中央，認為此劇為「反黨大毒草」。據說，鄧小平也看過此片，極為反感，乃責成中共中央發出「第七號文件」，命令對類似「苦戀」的「暴露文學」加以圍攻，不准再寫，也不准發表。

果然，中共軍隊機關報「解放軍報」於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日在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背——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這篇文章指出，中共軍隊文藝創作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和問題，文中說：「一方面左的錯誤思想需要進一步清除，另一方面也需要糾正存在的某些追求資產階級自己化的傾向，兩種傾向都是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

文中特別指出：「有的作品如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則已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已到了實際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反應了存在於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如果容忍這種錯誤思潮泛濫，勢必對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順利地進行經濟調整和四化建設。」

這是中共在打倒四人幫後，一再聲明今後不再搞運動，但一旦他們感到有動搖其獨裁統治基礎時，他們會毫不猶疑地再一次向知識分子猛撲過來。

這正如白樺自己講的，他說來到海外，許多海外作家對中國文學能引起強烈社會反響，表示羨慕。在海外的作家發表一本書後，常常無聲無息，如果那位州長願意公開對作品評論兩句，作家一定會感到榮幸，因為那將獲得很大的廣告效果。而在中國，作家發表有影響力的作品後，中央領導人會開會討論，官方報紙會連篇累牘地發表評論，固然作家要付出沉重代價，但這種社會效果，却是中國作家所獨享的。

大鳴大放危機四伏

白樺的遭遇，實際上是中國大陸很多具有愛國心、正義感的知識份子的代表。他長期以來反對中共文藝作品乙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他沉重的指出：中共的文藝作品中任何一個黨的幹部形象一定要等於黨，任何一個工人的形象一定要等

於整個無產階級。最後，人在文藝中消逝了，剩下的當然是一些貧乏的概念。他的作品，就是要突破這種概念化、非人性的、非文藝的枷鎖。他說：「當允許你放的時候，就潛伏著收的危機；當你放的時候，就為自己挨打、掙一頂（反革命）帽子、坐牢準備了條件。」白樺就是用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從事寫作的。

過去兩年來，白樺去過蘇聯，訪問過日本、歐洲，去年八月又應邀來到美國，他看到這些國家的進步繁榮、自由民主，深深覺得中國大陸想達到這種境界，要走的路還太長太遠，假如一九九七年沒有更進一步的改革，香港這樣現代化的國際大城市，將會在這個制度的桎梏下而蕭條，越南的悲劇或許不會重演，但情況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白樺這次來美國所談的問題相當多，涉及面極為廣泛，下面引用高魯賓先生對白樺講話的介紹：

白樺說：「我們的痛苦在於：主上不智，痛不欲生。歷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岳飛等，莫不如此。包公戲和『打金枝』所以久演不衰，因為中國老百姓只能從中尋找寄託，希望出現一個明智的皇帝。」

「直到上一世紀，中國才有了民主、平等、自由的觀念，一些非凡的巨人如譚嗣同等，拚命鼓吹，以圖喚起民衆。但中國百姓似乎麻木、逆來順受慣了。」

「時間是非常嚴峻的，從本世紀初的龍旗換成五色旗，青天白日旗、五星紅旗，血流成河，

但每次打倒一個獨裁者，又上來新的獨裁者。」

「二十世紀初中國共產黨成立，特別是八年抗戰期間，很多志士仁人湧入共產黨。共產黨當初提的口號是『耕者有其田』很受農民歡迎，大批農民入伍，解決了兵源問題。一九四九年以後，包括知識分子的一部份人在內，都認為共產黨什麼都是對的，都蛻變成爲植物人，認爲只要有陽光雨露；就可以茁壯成長。」

「文藝界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訓傳』，實際上是幕後奪權鬥爭。知識份子還誠惶誠恐地接受改造。這一切真相，都隨著十年文革破產了。有些人盲從，有些人什麼都不相信。憲法從來未認真地執行過，多變的政策，使人們失去了信心。」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造成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但七九年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還留下一些所謂『真正的右派』，以此來說明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並沒有錯。……巴金曾建議成立文革紀念館，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可惜不被上峯所採納。從這個紀念館，可以看到淵遠的歷史，就像歐洲還保留奧斯維辛集中營一樣。但上面不辦，民間是無法籌辦的。我們民族的弱點是不願照鏡子，很難接受教訓，一些事情，竟與五千年前相似。教育十分落後，造成全民族的愚昧，但愚民政策對獨裁者是有利的。狗咬狗是最好的統治方法，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一直在物色咬狗的狗。」

吃猴子故事的背景

白樺舉了一個「吃猴子的故事」來說明中國人

的悲哀：「一個北方人到了廣東，想嚐一次猴肉。當他們走入猴店，店主人把他們帶到猴籠前，請他們自選，那位北方人面對不斷打頭的猴和它們一雙雙恐懼、乞憐的類人的眼睛全部盯住他，他膽怯了，只好閉着眼睛隨便指了一下，所有的猴子立即抓住一隻被指認的猴子用力推向籠子的門外，那個可憐的不幸者流着淚，絕望地乞求地看着那位食客。」

白樺這個寓言故事，很容易看出，那羣籠中猴子是比喻大陸知識分子，想吃猴肉的是中共頭頭毛澤東一伙，當衆猴個個自危都面臨死亡時，大家便助毛推出「代罪」之猴，目的只希望自已可以苟延殘喘地活下去，白樺罵大陸軟骨頭知識份子入木三分，十分高明，但是他忽略了海外那些「猴子」，他們明知食客吃猴不當，居然故作不知，還替他們煽紅爐火，說那隻被吃的猴子自願犧牲，自求速死，並無不當。

白樺這個故事，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他們僅僅爲了個人倖免於難，不惜犧牲同類，在大陸上人人自危的情況下，還情有可原，可恨的是那些面對大陸苦難同胞將死而無動於衷的部分海外知識份子，他既幫助毛澤東、江青殺害知識份子，還鼓勵毛澤東、江青苛待知識份子。他們還蓄意替毛澤東、江青掩飾罪行，把大陸的知識份子描寫得豐衣足食，自由自在，並形容他們的生活似在天堂之中。白樺現身說法，用他自己的遭遇來印證大陸部分知識份子的無恥墮落。在他筆下，被海外左傾作家聶華苓吹捧的詩人艾青和作家姚雪垠，就是那些把同類推出籠外供吃猴

者宰殺的猴羣。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悲處就在這裏，明明自己受到逼迫害，一旦中共給點小恩小惠，他們仍可振奮精神，心甘情願地作咬狗的狗。

再看看下面的事實，當一九八一年白樺受批判時，一位大學生到武漢兵營中，要求見一見白樺，白樺怕影響他，不願見，但此大學生保證只見一面，一句話也不說。後來他見到白樺時，果然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放下一塊手中抱著的大石頭，底下壓了一個字條，字條上寫著：「願你像石頭一樣堅強。」

白樺把這件事講給一位詩人聽，詩人當時滿臉都是淚。但當最高領導說「苦戀」是反動電影時，那位詩人也發表了兇惡至極的講話。還有一位著名劇作家說，看到這麼反動的電影，他真要一頭撞到銀幕上。在一九八一年「思想陣線座談會」上，許多文化巨人搖身一變爲小丑，進行對他的不實批鬥。唯有吳祖光能直言不阿，發表了「多鼓勵，少打擊」的言論。

民族文化水平低落

到了一九八七年，保持沉默的知識分子已多於落井下石的人。但仍心有餘悸，只私下議論，而未能大聲吶喊。

白樺認爲，中國大陸在近幾十年來的「立」了最陳舊的東西，就是忠君思想。毛澤東弄權對劉少奇、林彪的「立」和「廢」，實質上與封建帝王弄權沒有兩樣。「忠」字在中國大陸上陰魂不散。白樺認爲在受了大災難之後的大徹大悟是悲哀的，走得筋疲力盡才發現是在地上兜了幾個

圈子。白樺說，即使在目前，正義的呼聲仍是相當微弱的。「自古聖賢多寂寞」，走在前列，能喚起覺悟的仍不多。

中國歷來的各項運動，目的只有一個，即檢驗人們的忠心程度。目前全民族文化水平太低，而有人又不願意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在通向光明的道路上，絕不是有了財富就什麼都解決了。

權力變成貨幣流通

白樺對中國大陸社會目前貪官橫行、等級森嚴的社會現狀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中國大陸在「立國」之初，權力已成了看不到的貨幣，在流通交易。文字上的法律條文完備，却沒有完善的執法系統。更悲哀的是所有的幹部，普遍對權力迷信崇尚，不講真話。

白樺以張志新說真話而慘遭殺害的悲劇，道出在鐵腕獨裁統治下人民言論被封殺。白樺說，目前在民間的呼怨聲極爲強烈，例如在上海的公共汽車上，大衆場所可以聽到羣衆的尖銳批評，可是在知識份子中却出現一種反常的沉默。

白樺說，他在香港時曾遇到一名富商，該名富商向他透露一名中國政治局委員的女婿到香港三年後便氣粗腰壯，購置豪華遊艇，極盡揮霍之能事。由此可見，官階是處處與個人利益勢力相攸關的。

白樺說，大企業效率極低，勞動者消極怠工，物質匱乏，造成走後門之風嚴重，營私舞弊層出不窮，商店服務態度之差，世界屬第一。全民

灰心有如上海肝炎傳染一般。

高稅收，使個體戶必然要逃稅，個體戶的賺錢史就是逃稅史。這使他們不願擴大再生產，有了錢就揮霍光，紙醉金迷。中國大陸花高薪，供養一批礙事的人，而不是辦事的人。

他說，中國歷史的惡性循環仍在繼續。中國大陸的森林面積，在全世界按人口平均是最少的，但仍然不斷地在砍伐，以致長江源頭植樹已基本被破壞，長江成了另一條黃河。各地、縣的林業局是超級政府，他們大批破壞自然，破壞生態。造林的數目，如只從報表上看，中國森林面積是世界第一，但那只是紙面上的。日本人喜歡用木材，但他們本國的樹，一棵也捨不得砍，木材幾乎全部進口。一個不要未來的民族是一個低劣的民族。

白樺說，五十年代初，他在雲南及西南一帶，到處看到鳥語花香，如九寨溝的原始風景，比比皆是。三十年後再回去看，竟是滿目瘡痍，令人怵目驚心。

已經沒有禮儀痕跡

有人問中國有無希望呢？白樺說：「一個民族沒有希望就會滅亡。中國只有摔掉包袱，大踏步地前進。可惜，進展緩慢，負擔太重，車輪又不圓。但是，全民族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需要聲音。能發出聲音的人，是有膽識的。一時不敢發出聲音的人，起碼可以保持沉默，不要學咬狗的狗。」

白樺講演後，所有的聽眾都感到心情沉重得

很，他對中國大陸現狀描繪得是多麼可怕的一幅圖畫，但你又不能不承認他講得多麼真實。

中國大陸變色後，中共統治已經四十年。毛澤東看透了知識份子的心態，他的槍桿子政權一建立，就開始向知識份子步步緊逼，焚書坑儒，捕殺文人，一個也不讓他們漏網。白樺提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六十年代的飢餓與死亡，文革十年滅絕人性的鬥爭。誰聽到這些誰不為之動容？誰不為之哀嘆？誰不為之反思？正因為中共建國以後採取愚民教育政策，至今大陸上還有二億二千萬文盲，人們一旦失去了教育培養，就會變成無禮、無知、無仁、無義了。制度才是造成人的素質低落的唯一原因。

誰有勇氣仗義執言

海外知識份子回大陸旅遊或探視期間，都有一個共同印象，覺得素質低落的人，還是那些「新中國」出生成長的年輕人，這些所謂城市「知青」，站在寫着「文明服務」標語的櫃檯前，對每一個客人態度惡劣、言詞粗魯。號稱禮儀之邦的中國，在大陸上已經看不到禮儀的痕跡。這個問題在共產集團國家中普遍存在，倒不是中共特有，不過中共比其他共產國家更為厲害。

海內外中國人，無不關心中國的未來，因為海外華僑百餘年來深受祖國不強之苦，而中國大陸自中共接管政權後四十年來，非但沒有強大起來，反而倒退。弄得連老百姓褲子都穿不上而造出的原子彈並不值得誇耀；只有經濟力量的提高才能顯示出國家的真正強大。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世界上人口眾多的貧窮落後地區；而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由於祖國不強，除了為數不多有成就的人外，絕大多數都處在中下生活水平之中；像紐約的中國城和倫敦、巴黎的中國城都是如此。

中共對這些情況視而不見，非但不吸取教訓，而且將手伸向海外，分裂海外華人，使他們內鬥不已，使本來就體單力薄的華人團體，更加衰弱。反觀亞裔的日本人，和韓國人，前者仗仗他們祖國的強大經濟力量，在全世界投資，奔走於西方世界的上層社會。後者急起猛追，也逐漸走向西方的中上層社會。而日本人和韓國人又都能團結一致，凝聚成一種可畏的力量，在海外開拓新的邊疆。

日、韓移民時間比華人短，但他們在海外的社會地位已超過了華人，難道這不值得引起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和中共政權深思嗎？究竟應以國家前途為重，還是應以自身的利益或是一黨之私的利益為重？請君選擇。

白樺身在大陸，竟敢在海外仗義直言，不怕回國受到中共迫害，他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